

邓贤
作品

长篇纪实文学

中国 知青终结

他们是一群用生命填海的红色精卫鸟
他们胸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偷越国境线
把生命和梦想一同埋葬在异国战场上
他们奏响了一曲血色年代的悲凉挽歌

十年来最难得的知青纪念读本





中国 知青终结

邓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知青终结 / 邓贤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38-6232-6

I. 中…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9132号

出版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6

印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尹宝茹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5438-6232-6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楔子

“汉人的血”

公元1970年岁末的一天，地处萨尔温江流域的L城忽然遭到大批来自金三角山区的红色游击队围攻。

L城距离中国边境大约有七十多公里，扼萨尔温江西岸地势平坦的交通道口，是金三角山区通往该国中部平原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门户，筑有坚固的地堡群、火力阵地和防御工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城守军为政府军一个加强团，另有一支地方部族武装协助防守，必要时还能得到空军飞机和驻扎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北部野战师支援，所以L城可以称得上是铜墙铁壁。

但是这天夜里政府军忽然遭到炮火袭击。炮火来自城外多个方向，呼啸而至的炮弹砸向守军营房、工事和火力阵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巨大的火光撕碎黑夜的厚幕与寂静，掀翻房屋，炸塌工事，把一些还在睡梦中的政府军官兵炸到天上去。那些侥幸未死的人连滚带爬地钻进战壕，拿起枪来向可恶的来袭者还击。

炮火之后，进攻者出现了。

数以千计的红色游击队员从浓雾遮盖的河谷地带、芭蕉树丛和凤尾竹林中钻出来。政府军看到，火光中的游击队员头顶伪装圈，身体湿漉漉的，像无数神话传说中的水怪、树精和石妖。他们动作敏捷地向前跃进——根本不是匍匐前行，而是身体贴着地面在飞。尽管政府军还击的火力十分猛烈，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夹着炸药包和爆破筒，前赴后继地向政府军守卫的城堡发动猛烈攻击。

这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

如果不是一支政府军机动部队意外地提前赶到，岌岌可危的L城防线恐怕已经失守。这支搭乘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援军是在白日即将落幕，晚霞熊

熊燃烧的傍晚赶到城下的，他们在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的掩护下向游击队侧翼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进攻，从而为城内守军解了围。

游击队不甘心眼看到手的胜利白白丢失，他们出动英勇善战的“知青旅”，趁着夜幕掩护发起最后一波破釜沉舟的进攻。但是敌人已经得到强大增援，他们把无数子弹和炮弹筑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厚实高墙，从而彻底堵死了进攻者通往胜利的希望之路。攻城失利，游击队损失惨重，指挥员被迫下令撤退，于是这些英勇无畏的红色游击队员就像发起袭击一样迅速撤离战场。他们卷起伤痕累累的残缺战旗，抬着受伤的战友很快消失在黑黝黝的河谷和山林之中。

炮火连天的战场终于沉寂下来，除了浓重刺鼻的硝烟和还在噼噼啪啪燃烧的树木房屋，地面上一片疮痍，都是触目惊心的弹坑和断壁残垣，还有许多尚未来得及掩埋的阵亡者尸体。

黎明时分，朝霞升起来，金灿灿的阳光开始驱散黑暗，渐渐照亮了死难者僵硬和没有知觉的身体。政府军打扫战场时才赫然看见，这些遗留的阵亡者尸体竟然多达数百具！细心的军官发现，这些游击队员多数都不是本国人，因为他们皮肤比较白，比较细腻，不像金三角当地山民皮肤又黑又粗，面部特征也不是高眉骨、凹眼睛、鼻梁扁平的掸邦、缅族或者克钦人，而分明是国境对面的汉人。他们看上去年纪都很轻，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喉结刚开始若隐若现，嘴唇上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毛茸茸的胡须。他们不像刚刚经历了残酷战场的血火厮杀，而像在放学路上贪玩过了头，安静地睡着了一样。

在一个年轻的战死者身上，军官找到一块残缺不全的红布袖章，上面能够辨认出来“红卫兵”三个汉字。

军官如获至宝，立刻把这个重要发现报告了上司，后来又通过外交渠道向国境对面提出照会。但是中国方面严正回答，中国在境外没有军队，也从来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出境。中国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充分尊重各国主权，云云。

无名死者化入泥土，沉入历史岁月的河流。后来L城郊外的战场上有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花热烈怒放，灿若云霞，当地人称为“啊娜米—莫”。

翻译成汉语意思就是：“汉人的血”。



楔子	“汉人的血”	1
第一章	高山下的花环	001
第二章	“红色的切”	011
第三章	知青壮歌	023
第四章	天地英雄	034
第五章	南下战役	047
第六章	大清洗	061
第七章	蛮光监狱	072
第八章	昨夜星辰	081
第九章	灯火阑珊	090
第十章	峥嵘岁月	100
第十一章	地狱晚钟	113
第十二章	苍山如海	124
第十三章	灵魂如风	132
第十四章	同船共渡	143
第十五章	战火中的青春	150
第十六章	桃花带血开	169
第十七章	“沙家浜”	184
第十八章	最后的知青	194
第十九章	天涯萍踪	204
第二十章	天堂花园	213
第二十一章	寻找“赤军”	221
第二十二章	大地之子	230
第二十三章	魂归何处	237
第二十四章	走不出的金三角	244
第二十五章	尾声	248

第一章 | 高山下的花环

1. 葬礼

20世纪90年代，一个金桂飘香的中秋之夜，西南边疆某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在家中去世了。

中秋本是亲人团聚的传统节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圆月象征普天之下的家庭不再残缺，亲人不再等待。但是，这一年享受中秋月光的人们中不再包括那个不幸的残疾人，死者独自躺在冷冰冰的黑暗中等待进入天国。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后才发现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他们清点死者财物，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一般来说残疾人没有多少财产，有钱人不会一辈子住在破房子里。当然没有财产不等于没有欠债和债务纠纷，而处理这类后事往往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民政局的同志很有经验，对死者的遗物检查得很仔细，力求处理得干净彻底，跟死者告别人世一样不拖泥带水。

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残疾人家里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上个世纪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多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的同志感到惊讶不解。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许多姓名和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的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所以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很可能欠了别人的钱，



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做个了断。

民政局的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的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表情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后面。这些从天南地北赶来送葬的人群激发了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送别亲人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那是二十年前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的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青山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用以救助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们留下的唯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方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红色战士×××之墓”。大家对此第一反应是惊讶，有种始料不及的感觉，随后则感到兴奋，像揭穿了一个谜底。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老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中并没有立功受奖的证明文件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许多年后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种植的树林已经有碗口粗，当地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那块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远方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的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

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震撼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这些军人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残疾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当地朋友告诉我，每年春季植树节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的狂热追随者。他参加过那场血火交织的L城之战，是一个金三角国际战场的幸存者，一个境外归来的红色游击队“知青旅”战士。

2. 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残疾人。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夏季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车，不是汽车，是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管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有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认识他还是在许多年前，那时候的人们都不富裕。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养老，却要自己出来挣钱？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一双手，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后来我知道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或者60年代初的中印自卫反击战没有关系，所以我认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是从抗美援朝或者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错了，我没有去过越南，也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事故？车祸？

他答：踩上地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是因为“文革”武斗吗？

修车匠问我：你听说过境外红色知青的故事吗？

我告诉他，我在边疆农场当过多年知青，我身边就有同学去了境外。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我就是一名境外红色知青，曾经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



我对老唐充满敬佩。老唐至今没有工作单位，他的职业只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劳动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为何没有获得相应的伤残待遇？他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他正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喝浓茶一边看电视，那台老式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的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14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据说还是个NBA球迷。尽管这个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馨、和谐和幸福气氛。老唐说：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是“知青旅”战士吗？

他点点头。

我说：能讲讲L城之战吗？听说那一仗伤亡惨重，许多知青都牺牲了。

他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情来，许久没有说话。

我只好换个话题说：既然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摇摇头，还是没有说话。

我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其中有什么难处吗？

他开口了，声音低沉：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好像在责备我的冲动，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分明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境外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 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做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无论下过乡的知青读者还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年轻学生，他们无一例外都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他们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呢？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生活？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听说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都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大嗓门男人，话音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儿说：我拜读过你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



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惊心动魄的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生忘死的崇高行为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的精神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怎么看待，这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答：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20年仗的老知青，老战士。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当时我并没有重写境外知青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对历史的误解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种被强加意志的感觉。我听见对方坚定地说：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4. 旅长

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了一起小小的群体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他们有男有女，聚集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都已头发斑白，岁月的刀锋在他们脸上无情地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印迹来，但是他们的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的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知青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般的震动。

这些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知青，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21世纪，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全球的世界级企业家、董事长，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奔驰”、“宝马”、“奥迪”如过江之鲫，《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中国的亿万富翁排行榜，新生成的成功人士、白领阶级和大大小小的老板成几何级数快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知青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6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没有同我打招呼，也不说话，像棵树那样沉默地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在营养普遍泛滥的今天，我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那么消瘦，他的脸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营养滋润的痕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丛干枯的骆驼刺。我认为他不大像读者，因为他手中没有书，也看不出要请我签名的意思。我正在疑惑，他抬起手掌，向我展示一张字条，我看见字条上面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小字：你想采访一个不寻常的老知青吗？他在竟（境）外打了20年仗，严重残废。但是你必须付费（采访）。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 老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他就是那个不寻常的境外老知青，闻名遐迩的知青旅长。

我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在哪里听过。等跨进屋我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知青旅长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锯齿，这些锯齿一下子就在我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敌人的枪榴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说话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电



话中那个大嗓门读者。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迟早要见面。我怀着尊敬的心情问他：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知青旅”旅长吗？

他答：我担任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干部。我曾经在“知青旅”打过仗，但不是旅长。

我微微有些失望。我说：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然后简短回答：游击队失败了，知青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答：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我说：能说说游击队为什么失败吗？原因何在？

我看见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因为政变失败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血的教训啊。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答：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队伍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跟那些败类同流合污一样。老康向我展示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泛黄的相纸显示出这张照片的年代久远。我看见照片上有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他正好面对镜头俯下身来，向着一群担架上的知青战士伸出手。知青战士显然都负了很重的伤，有的躺着，有的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认出来离老人最近的那个伤员就是当年的“知青旅”战士康国华，几十年前的他年轻得像一片嫩树叶，我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障，但是我从年轻伤员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紧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中，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心情。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唤起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有关神圣和崇高的回忆，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无比虔诚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位老人就是××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

牺牲了。

我说：跟你一起的知青伤员现在都活着吗？他们在哪里？

他答：有的回国了，多数人牺牲了。

我转过身，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深渊里。我听见老康继续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的战斗历程吧，那么多人无怨无悔，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自己谋私利吗？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儿值得纪念的东西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这代知青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我们都是朋友，朋友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过去的的生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着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面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 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朱小迪介绍的，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当我按照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夹克衫矮个子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有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了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



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枪伤等于军功章，是可以傲世的资本。但是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境外游击队从军达十几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政委，可以说他为自己追求的崇高事业贡献了全部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答：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以后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也是在境外从军多年的女知青，是闻名遐迩的游击队“老板娘”，如今她在昆明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由此我们的话题围绕境外知青展开来，可以肯定地说，梁晓军夫妇是一对优秀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上个世纪中叶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国际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他们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在金三角丛林浴血奋战的老知青，老游击队员。他们都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的，或者说是特意为我安排了这场不寻常的战友聚会，令我十分感激。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境外知青里，我得知他们大多数曾经是“知青旅”官兵，其间不乏当年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指挥员、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的身体和心灵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留下的深刻印记，个个都有许多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因此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

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很少对外人开启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第二章 | “红色的切”

1. 格瓦拉

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Serna, 1928—1967年）古巴革命领导者之一，“游击中心论”创始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一庄园主家庭。1946年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年12月，曾游南美各国，195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次年赴墨西哥，加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组织——“7·26运动”，后在墨西哥城附近接受游击战军事训练。1956年11月，格瓦拉和新组成的古巴远征军登上“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湾向古巴进发，后转移到马埃斯特那山区。1957年5月，格瓦拉率军攻占乌维罗兵营，被授予起义军最高军衔——少校。任第二纵队司令。1957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历任全国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1962—1965年任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65年4月，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先到非洲，后入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组织，进行武装活动。1967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政府俘获后杀害。生前著作甚多，有《游击战》《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游击战：一种手段》《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

——《外国历史名人辞典》